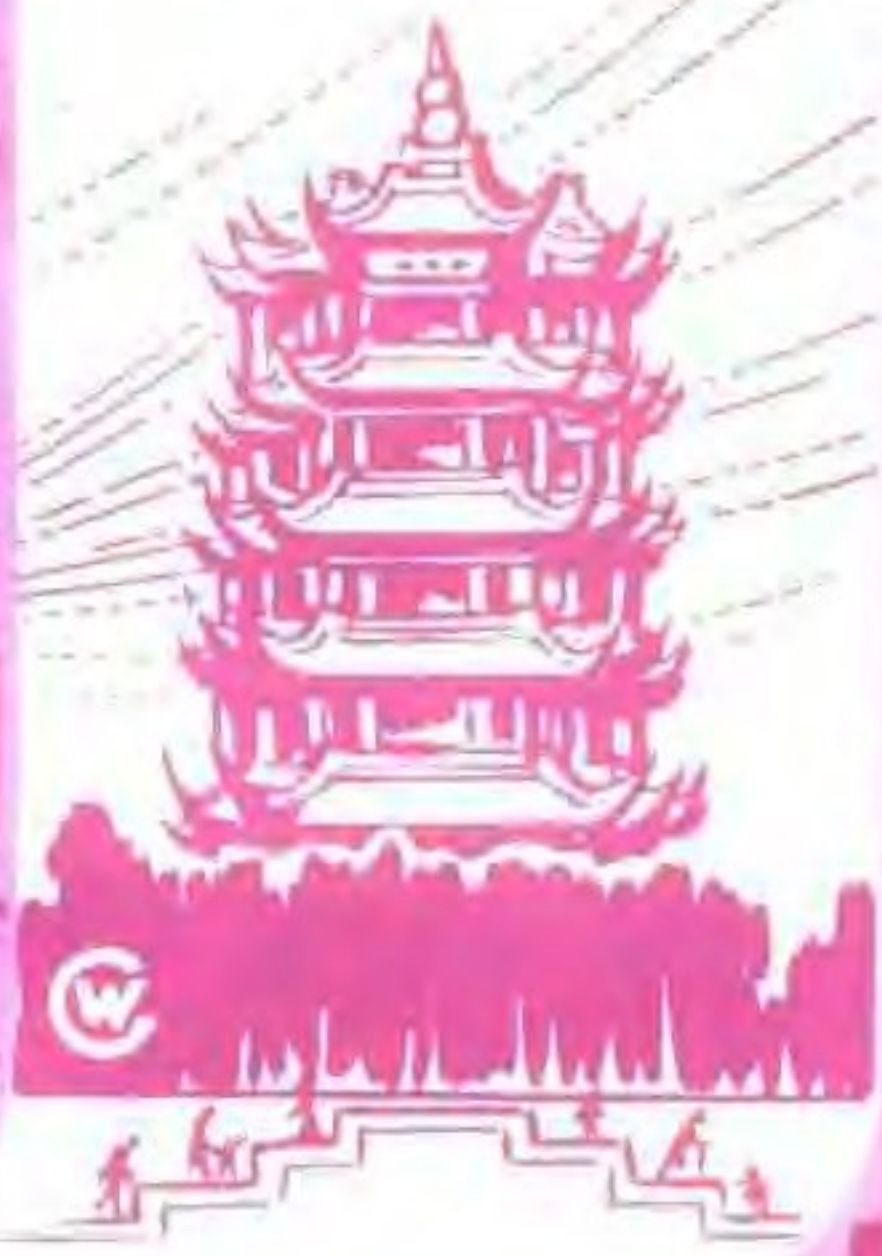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一辑

江夏春秋·风云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China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一辑

江夏春秋·风云录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武昌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洪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青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武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China

ZB02/13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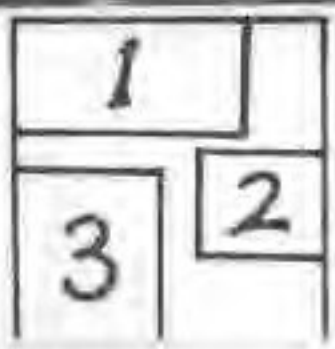
1992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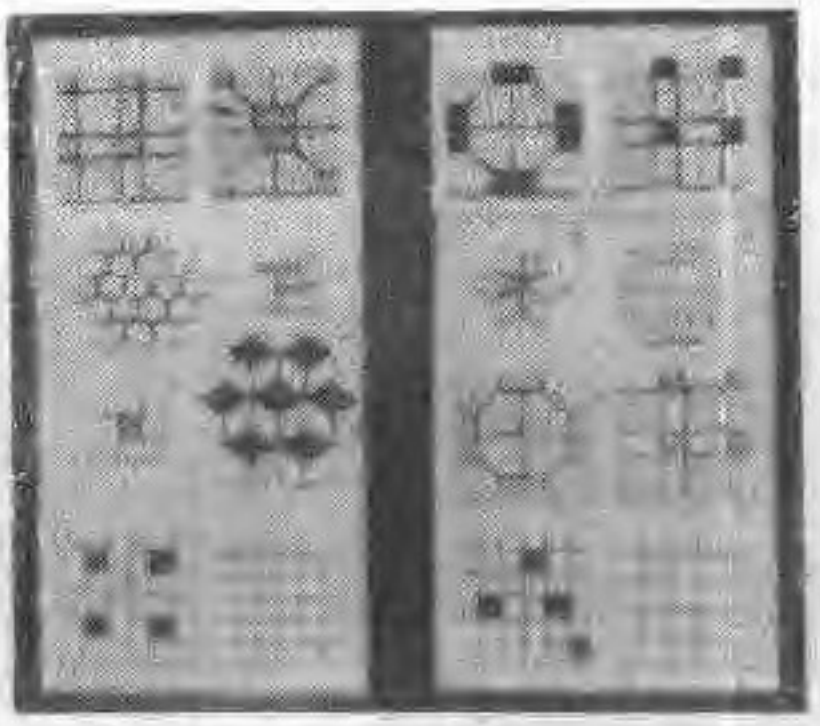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印刷：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　字数：150千字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印数：1—65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6号

定价：2.20元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3B08/13





①现任厂长、法人代表，1990年、1991年武汉市优秀企业家王平和同志正在工作

②生产的各色马赛克产品

③原料车间喷雾塔

（由武汉瓷厂宣传科供稿）

China

武汉瓷厂位于汉阳区十里铺，始建于1958年，是当时国家在汉兴建的200项工程之一，占地面积近9000m²。该厂现有职工1300人，固定资产1473.5万元。主要生产陶瓷瓷砖和马赛克，年生产能力120万m²，是武汉地区生产建筑陶瓷的唯一厂家。

该厂在生产中，十分注重产品质量。该厂生产的"盾牌"瓷砖、马赛克，曾分别荣获"武汉市新产品开发三等奖"和"武汉市优质产品奖"的称号。该厂的瓷砖已被湖北省列为优质产品，马赛克已被国家建材部列为"部优产品"。

该厂所产陶瓷锦砖色彩丰富绚丽，图案新颖，具有清洁、耐久、耐磨、耐酸、防腐、防潮等特点，用于装饰建筑物地面、墙壁，立体感强，美观大方。陶瓷面砖具有防潮、防腐、清洁、耐久等特点，色调匀称、轻快。

武汉瓷厂的产品除行销湖北、武汉地区外，还远销华东、西北等地区，靠着良好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可信的售后服务，在用户中赢得了良好的信誉。

武汉瓷厂的法人代表是武汉市优秀企业家之一的王平和同志。他自任厂长以来，大胆改革，勇于开拓，奋力进取，带领全厂职工共同奋斗，使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

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　　**电话：** 444577　443884

邮码： 430051　　**厂长：** 王平和

China

目录

文作家藏书

一场资产阶级宪政试验缩影
——湖北咨议局纪实……肖建东（1）
辛亥首义前后……杨经曲　遗稿（10）

“五·四”运动在武昌……孙　凯（17）
湖北妇女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纪念省女师学潮70周年……刘晋文（19）

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武昌农讲所……全国正（28）
北伐贺胜桥之战……周士第（36）
二次北伐时击溃夏斗寅的战斗……孙俊民（41）
中山大学学生声援震寰纱厂……黎显荣（50）
大革命时期的保福祠农民协会……涂康民（55）
豹澥地区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熊述亲（59）

“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武大……刘以刚　徐红英（62）
火烧金水农场……祝匡时（69）

抗日时期国民党武昌县政府的变迁……石　钟（73）
中山舰金口遇难目睹记……于　泰（77）
抗战初期的珞珈山……沈　毅（79）
游击队夜袭山坡日寇据点……安士忠（84）

China

中秋之夜的枪声……陈振应（87）
奇袭日军青山飞机场……汤楚英（90）
回忆参加鄂南武工队的活动……梁子风（96）
我为新四军送情报……赵华全（99）
战斗在金水线上……祁曙东（103）
武汉沦陷期间的李家桥地下党支部……刘敬斋（110）
沦陷期间日寇在武昌的暴行……曹　非（112）
历史留下的记忆……李正奎（121）

活跃在武北地区的“鄂南工作团”……张少卿（123）
武汉“民先队”地下斗争二三事……齐世达（127）
珞珈山“六·一”惨案……徐正榜（131）
黎明前的斗争……刘祖芬（135）
张轸部在武昌县起义经过……陈德达（138）
湖北“和平运动”亲历记……吴先铭（146）
武昌县人民政府成立经过……金　锋（153）

鄂南剿剿话当年……万学海（155）
清匪反霸中的豹溪暴乱事件……李明炎　马志堤（158）
武昌区街道民主改革与民主建政……任延平（162）
忆天兴乡的土地改革与复查运动……金　锋（170）
花山镇土地改革纪实……张朝春（174）
参加武昌县的“三反”运动追记……周锡光（178）
武昌县的“马振扶事件”……程宝书（182）

※　※　※　※

武汉瓷厂图片二组……封二、封三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史作忠藏书

一场资产阶级宪政试验缩影

——湖北咨议局纪实

肖 建 东

20世纪刚刚拉开序幕，一场资产阶级宪政试验就在中华大地酝酿和展开，湖北咨议局即是其中的缩影。

（一）湖北咨议局的成立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并于第二年10月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为宪政作准备。湖广总督赵尔巽遵旨设立了“湖北咨议局创办所”，划分了选举区域。赵尔巽被调任后，陈夔龙任湖广总督，继续进行湖北咨议局的筹备工作。

1908年7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限令各省在一年之内完成筹备咨议局的工作。湖广总督陈夔龙即按清廷要求将“湖北咨议局创办所”改为“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具体筹备和选举议员。1909年，湖北全省举行咨议局议员选举，经6月2日初选和7月31日复选，选出议员80名，专额议员3名。10月3日，吴庆焘当选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当选为副议长，刘赓藻、张国溶、吕逵先等17人当选为常驻议员，刘耕余等被选为候补常驻议员。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虽然仅占全省人口的0.38%，议员也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但作为一次“民选”，在中国土地上毕竟是破天荒第一遭。

湖北咨议局当选议员，大都有功名和一官半职，又多少接受

China

了一些资产阶级近代化思想。如汤化龙沿科举之路走上仕途后，见“世变益亟”，便誓求新知，毅然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湖北后，汤为立宪奔走呼号，时称“宪迷”。其他议员如张国溶、刘赓藻、胡瑞霖等都与汤化龙有类似的经历和思想。

1909年10月14日，在湖广总督的筹划和组织下，湖北咨议局开局典礼在武昌召开，由咨议局议长正式宣布湖北咨议局成立，筹办处即日裁撤。10月14日至12月2日，咨议局举行了第一次常年会议，议决了70多项议案，选举产生了法律等5个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胡柏年等15人为资政院议员。

湖北咨议局的主要任务是审议督抚交议、议员提议和人民陈请建议的议案，但其活动必须遵循清廷颁布的《钦定咨议局章程》及宪政编查馆明定的专条。按章程的有关规定，咨议局“为采取舆论之所”，“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议院基础即肇于此”。但“咨议局议定可行事件”必须“呈候督抚公布施行”。如果咨议局与督抚意见不一，则由资政院请旨裁夺，“固不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本旨也。”如果咨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如果咨议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有妨害国家治安者”，“督抚则奏请解散”。

由此可见，湖北咨议局是地方议会的雏形，并准备成为以后湖北省议会的组织机构。

（二）湖北咨议局与立宪请愿运动

1908年7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期满召开国会。但各地立宪派嫌预备期过长，纷纷要求速开国会。湖北立宪派汤化龙、张国溶等人于同年成立宪政筹备会，为早日立宪而奔走呼号。

湖北咨议局成立后，各地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出现。1910年5

China

月20日，湖北立宪派以湖北咨议局为中心成立了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咨议局议员张匡溶被推选为干事长，汤化龙、张国溶等议员还发起组织了汉口宪政同志会，出版《宪政白话报》，将清廷颁布的立宪上谕和《钦定宪法大纲》译成白话文刊登，力争做到家喻户晓。在湖北咨议局议员的积极推动下，“湖北成为国会请愿的急先锋”。

1910年上半年，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二次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但均遭清廷拒绝。国会请愿代表仍不屈不挠，决心“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湖北方面积极配合，在议员张国溶的主持下，湖北国会请愿同志会于7月12日召开第三次国会请愿发动会，决定响应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发出的再作第三次请愿的号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会后，汤化龙、张国溶等议员立即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共磋请愿事宜。8月10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汤化龙在争取速开国会及争取咨议局实权方面慷慨陈词，“持议最为恳挚”，被推举为联合会会长。在这次会议上，张国溶被推举为联合会起草员，成为联合会的主要会员之一。张国溶提出的《请速开国会提议案》，为北京资政院讨论通过上奏，对以后促使清政府缩短立宪期限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汤化龙、张国溶等湖北咨议局议员回鄂后，更努力地宣传他们的主张，造成了更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声势。汤化龙还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之间，经常集会通电，与各省遥相呼应，群情更加激昂。

1910年10～11月间，资政院首次开会。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汤化龙的组织下，趁机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代表们向载沣上书，痛哭流涕，恳请召开国会。湖北方面积极配合，在张国溶等咨议局议员的发动和组织下，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联合武汉各团体于11月12日到湖北咨议局聚集，前往湖广总督衙门请愿。到总督衙门后，武汉各团体推举10名代表，由议员张国溶、吕逵先领

China

衔，向总督瑞澂呈递由张国溶起草的《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陈请建议代奏速开国会案》。面对“武汉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瑞澂允诺“即咨资政院，并电东、滇二督联衔上奏续请”，要求请愿诸人“静候之”。在全国各阶层人士的要求下，清政府被迫宣布拟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开设议院，而命令民政部将各省代表即日解散。

第三次国会请愿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加强了各地立宪派之间的联系。就在各省咨议局代表酝酿成立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的宪友会之际，清廷于1911年5月（辛亥四月）成立了皇族内阁，主要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中。清王朝假立宪的真面目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愤慨和抨击。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多次呈文请都察院代奏，明确反对“皇族内阁”。张国溶起草的《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力言皇族与内阁在宪政上势不两立的道理。但清廷对请愿一概加以峻拒，严令请愿代表“即日归散”。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请愿活动终归以失败告终，汤化龙、张国溶等议员只得“郁郁归鄂”。

请愿活动虽然一再失败，但立宪派仍不甘心。辛亥五月，咨议局联合会再开，汤化龙“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汤“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在北京举行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湖北议员汤化龙和胡瑞霖力主推倒内阁，胡瑞霖还提出了推翻内阁的具体步骤。湖北议员的这项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全会认定必须推倒“皇族内阁”。在这一场仿效欧美资产阶级政党企图“倒阁”的运动中，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走在抗争的最前列，成为立宪派人物中的激进派。

在最后的建言遭清廷拒斥后，全国各地的立宪派对立宪纷纷宣告绝望，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湖北咨议局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已隐然成为革命党的同盟者，如竭力保护被湖广总督查封的由革命党人主办的《大江报》等。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三）湖北咨议局领导的湖北铁路风潮

从1904年开始，湖北地方士绅出于爱国热情就有商办本省境内粤汉、川汉两铁路的要求，反对清政府的借外债筑路政策。湖北咨议局成立后，拟组织铁路协会从清政府手中争回路权。恰逢湖北留日学生公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运动各团体争回自办，湖北咨议局诸议员于张、夏抵达武昌的当晚在咨议局召开特别欢迎大会。在会上，议员刘赓藻倡议“各议员将所得薪金以九五助捐，即在办事处扣提，以作组织铁路协会经费”，并请张、夏两位代表草拟铁路协会章程，以便联合武汉一切团体，合力坚拒。刘赓藻的建议立即获得通过，并由议长“推举刘赓藻、张国溶、夏寿康、汤化龙、魏寅宾等10人为铁路协会会员”。张国溶、吕逵先两议员还自愿担负起联合各团体的重任，并推举议员万昭度、金式度介绍张、夏两代表前往各团体联合。最后，经咨议局全体议员议定，准备即刻电告清廷，要求商办铁路。11月5日，在湖北咨议局的发动和组织下，湖北铁路协会正式成立。在此前后，在外地任官的鄂籍人士纷纷电函湖北咨议局，以示支持；而省绅则联名函呈咨议局，“皆以拒借归商办为唯一主义”。

1909年11月12日，湖北铁路协会联合绅学两界在教育金开会，共商筹款大计。会议一致认为拒债“重在筹款”，并拟定了分派筹款的数额。湖北咨议局首先带头，议长吴庆焘代表全体议员承担100万元。各地议员和代表随后纷纷认股，合计口头认款500余万元，均分5年交齐。11月14日，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四官殿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特别大会，盛况空前。与会者一致认为，“借款约之废与不废，全视鄂人筹款之力与不力”。会议确定了“拒债筹款”的办法，由各界代表具名报款。汤化龙首先表示咨议局愿承担300万元，以为“全省之先导”。随后，铁路协会进行职员选举，前广西藩司刘心源当选为正会长，湖北咨议局

China

议员张国溶、万昭度、刘赓藻等多人被推选担任各种要职，成为铁路协会的中心和骨干。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会议还选派代表晋京请愿，申诉商办铁路的主张。

在湖北咨议局的鼓动和组织下，筹款工作迅速步入高潮。1909年11月25日，铁路协会“又在四官殿开商办铁路会议，商界到者千人”，“是日认股五十万之谱”。湖北绅商学军各界，此时也争相开会筹款。为了使筹款工作井然有序，湖北咨议局于阴历九月二十九日讨论集股办法，决定用商办名义；阴历十月十八、十九两日咨议局再次集会，讨论通过了“按收租谷五十石勒认一股”的办法。

1909年底，湖北铁路协会晋京代表在千余人的欢送下启程北上，向清政府请愿。在晋京代表的苦苦哀求及湖北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邮传部于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铁路公司，招股商办铁路。然而，湖北集股情况十分缓慢，实收现款仅130多万元。邮传部以此为由，准备再次将铁路收归部办。湖北咨议局闻讯，立即联合湖北绅学商军各界团体，于1910年9月匆匆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以图挽救。该公司成立后，认定股款的虽有所增加，数额达1000余万，但“现缴到之股，尚不足二百万”。拒债保路运动陷入了自身的困惑之中。

1911年1月，清廷委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准备将铁路收归国有，借款筑路。湖北咨议局为此十分焦急，议长汤化龙（吴庆焘任议长为期不到一年）以“关系国家存亡”的心情联络各省咨议局议长“准于四月朔在北京联合会筹议挽救之法”。4月26日，汤化龙抱定“路亡与亡”的决心与张国溶一起赴京请愿。但湖北内部在拒债保路的问题上已出现激进、和平两派，以刘心源为代表的和平派对激进的湖北咨议局采取了不支持的姿态。不久，清政府于5月9日正式下达铁路国有的诏书，汤化龙等议员不免“热念却消”。于是，汤化龙从力争自办转而要求不撤民股

China

并设置查帐会以“隐收民有之实效”，但被清廷拒绝。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湖南绅商首先起来反对，广东响应，而四川的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湖北方面，湖北咨议局立即刊发传单，于5月11日在四官殿铁路公司联合军绅商学界开会，“由诸议员演说路政损失之利害，听者莫不悲愤交集”。《民立报》1911年5月21日登载会议报导中，曾说：“闻自争回路事以来，未有如此会议之激烈者。”6月8日，湖北咨议局柬邀四川派赴两湖和广东的代表会商对策，决定对邮传大臣盛宣怀滥借外款，“收路于民，转奉外人，丧尽国权”的行径采取一致抵制行动，并推举已经在京的湖北咨议局议员郑万瞻为湖北与湘川粤省的全权代表，另加派一、二人前往协助。湖北咨议局还联合绅学商各界集会，发表演说和宣言，声讨铁路国有政策。但湖北和平派已倾向于铁路国有政策，股款已相继退还，再加上湖北当局一直采取禁阻措施，致使湖北保路运动虎头蛇尾。

（四）武昌起义期间的湖北咨议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次日上午起义士兵控制了武昌全城。由于当时起义军群龙无首，革命领导者均不在现场，蔡济民等革命党人相继来到湖北咨议局，与咨议局议员共商都督人选事宜。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革命党人欲举汤化龙为都督，汤婉辞谢绝，但愿站在革命方面从事行政工作，议员胡瑞霖也以钦佩的心情自愿为革命筹措款项。经革命党人提议，由议员们与革命党人共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长。当时黎元洪拒不接受拥戴，经汤化龙等议员劝说后，才消极任职。

10月11日下午7时，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员继续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地点设在咨议局。由革命党人组成的谋略处作为军政府的决策机构掌管实权。

China

湖北咨议局方面，汤化龙被推举为总参议，参与由革命党人控制的军政府。就在这一天，议员胡瑞霖特意向武汉商会垫借5万元以充作起义士兵的临时饭费，并将大银宝149个、小银宝15个交给政府军需部。

10月11、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武汉革命形势为之大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员再次举行联合会议，制定相应的对策。会后，黎元洪约汤化龙共同签发一系列呼吁各省响应的檄文，汤化龙本人则代表咨议局电促各省咨议局响应。同时，汤化龙还协助黎元洪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副议长夏寿康和议员吕逵先分别负责赈济和治安，以稳定地方秩序。此外，汤化龙协助黎元洪接见法、美驻汉口领事，并代表军政府声明：革命目的在于建立民主共和，尊重列强的在华利益，但不承认10月10日后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借款。帝国主义强烈意识到这不是另一次义和团，又无借口可找，于是列强驻汉口领事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并于10月18日宣布中立。

为了鼓舞士气，统一号令，革命党人和咨议局汤化龙、胡瑞霖等议员于10月17日联合举行“祭天大典”，由都督黎元洪主祭。通过这一仪式，提高了黎元洪和立宪派（主要是咨议局议员）在军政府中的地位。

由于湖北军政府系仓促成立，各种组织很不完善且漫无秩序。为此，汤化龙与胡瑞霖、黄中恺等立宪派起草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但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冷遇。居正到武昌后，汤化龙通过居正使革命党人接受了这个条例，并由都督黎元洪在10月17日公布施行。根据这个条例，都督府分为军政、民政两大部，由都督统辖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兼总司令，汤化龙被推举为政事部部长。政事部下设的7个局基本由咨议局议员掌握。湖北咨议局议员在军政府中占据优势。汤化龙等议员草拟的这个条例影响很大，同盟会员居正评价说：“其后各省先后光复，各

China

建都督府略依鄂军政府条例”。但这个条例引起军政府内革命党人的不满，孙武等人在10月25日改订了这个条例，使革命党人在军政府中再度占居优势。

在湖北军政府进行改组之际，武汉战事方亟，南京未下，革命正在全国迅速蔓延。汤化龙等湖北咨议局议员预见必将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遂潜心拟订约法。恰逢黄兴、宋教仁抵达武昌，与汤“交相爱重”。宋教仁与汤“尤投合”，于是两人在汤化龙家里共同磋商并由宋教仁执笔草拟了《鄂州约法》。这部获得革命党人和咨议局议员共同赞许的约法，在中国第一次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鄂州约法》是湖北军政府的一项光辉业绩，成为日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要基础。

面对烽烟四起的革命局面，袁世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进行和平试探。11月11日，南北会谈在武昌举行。汤化龙、胡瑞霖、孙发绪作为湖北军政府的发言人力主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当天晚上，汤化龙起草了“黎元洪致袁世凯书”，力劝袁世凯“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则“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这表明，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湖北咨议局已站在反清的立场上了。

1911年11月，湖北军政府已组织完毕，武汉战事趋向缓和，革命在大多数省份已取得成功。汤化龙以参与组织全国政权的意图辞职前往上海。至此，湖北咨议局作为一个机构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912年2月成立的湖北临时议会正式将它取代。

（武昌区政协供稿）

China

辛亥首义回忆

杨经曲 遗稿

首义前的湖北革命活动

湖北的革命组织，自宋教仁、欧阳瑞骅、胡瑛等在甲辰年(即1904年，光绪三十年)组织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曹亚伯、朱子龙等在乙巳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组织的“日知会”相继失败后，继起的有黄申芗、杨王鹏、廖湘云、刘复基、詹大悲等戊申年（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组织的“群治学社”，刘公、孙武、焦达峰、查光佛等在己酉年（即1909年，宣统元年）组织的“共进会”。后“群治学社”改“振武学社”旋又改称“文学社”。辛亥春，谭人凤来鄂视察党务，主张两派合并，统一组织，推孙武为会长。这时湖北革命运动已普及各处。

四月（农历，下同），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四川风潮突起，湘、鄂、粤三省人士呼应，掀起了一次护路运动的高潮。清廷派铁路大臣端方统率湖北第八镇第十六协所属的三十一标第二营及三十标的一、二两营入川镇压。当时湖北党人估计，全武汉军营人数虽有万余，其听督署指挥的，除三十标步兵第三营（皆八旗子弟）、宪兵第八营（多旗人）、教导营一营（为张彪亲信）外，余均无所顾虑。革命党人方面，可靠同志有3000左右，多系官长下士，因此认定武汉举义时机已趋成熟。并估计发难以后，响应必多，不难一举而定。决议推刘公为都督，刘英为副都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